



新闻传播学精品文库



成舍我新闻学术论集

下

刘家林 王明亮 陈龙 李时新 编 著

舍我先生将其一生奉献给了中国新闻事业与新闻教育，以终身记者自许。直至晚年病中口不能言，仍以笔书写「我要说话」四字，恰是舍我先生毕生事业写照。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J&C

成舍我新闻学术论集

下

刘家林 王明亮 陈龙 李时新 编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成舍我新闻学术论集 (下册) / 刘家林, 王明亮, 陈龙, 李时新编著. —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2. 5
(新闻传播学精品文库)
ISBN 978-7-5668-0163-0

I. ①成… II. ①刘…②王…③陈…④李… III. ①新闻学—文集
IV. ①G21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56022 号

.....

成舍我新闻学术论集 (下册)

刘家林 王明亮 陈 龙 李时新 编著

出 版 人: 徐义雄
策 划 编 辑: 杜小陆 史学英
责 任 编 辑: 史学英 梅 兰
责 任 校 对: 何 力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市广海照排设计中心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41.5
字 数: 608 千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
上下册总定价: 98.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本书由暨南大学“211 工程”项目“传媒产业与新闻传播研究”暨“教育部特色专业新闻学”重点资助出版

新闻传播学精品文库编委会

学术顾问 林如鹏 范以锦

主 任 杨先顺 张晋升 支庭荣

编委会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申启武 刘家林 吴予敏 林爱珺

星 亮 董天策 蒋建国 曾建雄

蔡铭泽

总 序

关于构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闻 传播学理论的圆桌对话

在 201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同志强调要着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这为全国社科界的理论创造工作描绘了一种新的可能性。那么，新闻传播学是否可以建构立足本土的具有自主创新色彩的新理论和新知识？又该如何进行学术上的突破？围绕这一话题，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蔡铭泽教授、申启武教授、支庭荣教授展开了一场圆桌讨论。

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理论有待新突破

支庭荣：我们今天关注的是，有没有可能产生带有鲜明中国特色，又能被国际学术界所重视的新闻传播学理论？

申启武：关于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理论创新问题，可以用媒介生态研究作为例证。事实上，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国内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与西方的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有很大的区别。有人将西方的此类研究改称为媒介环境学，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他们的研究主要关注环境、文化和技术方面的媒介命题，称之为媒介生态学，显得十分牵强。反过来，从交叉

学科的角度看，国内的媒介生态学研究关注生态因子、生态关系，才更符合生态学的本意，才是扎根于生态学的。因此，媒介生态研究，是很有中国特色的一个领域，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蔡铭泽：中国新闻史不用说，自然具有中国特色。从新闻学理论来讲，这方面的研究确实没有好好地、认真地做起来。我们现代报业的源头、我们新闻和传播理论的源头，来自国外的东西太多了，甚至是照抄照搬西方的东西。举例来说，中国新闻学最早受美国的影响，也许是间接通过日本人的介绍和引进。19世纪90年代松本君平的《新闻学》，专门讲到了欧美的新闻事业，1903年被译介到中国。从1917年开始，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就参与到中国的新闻教育中来，与燕京大学有很多合作。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一度很深，新中国成立后，向《真理报》学习成为热潮。总之，我国在学习整理国外的新闻学理论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改革开放后，通过反思和引进西方的传播学，在理论上有所进步。但是，我们取得了多大的突破，实在很难评价，基本上处于收集、介绍、整理的阶段，仍然缺乏非常好的非常深入的研究。

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值得深入开掘

蔡铭泽：其实，办报作为人类传播信息的一种方式，中国人很早就开始了。古老的《易经》，本质上是通过信息的传递来考察如何作出正确的决策，它包含了很多数理传播的内容。当然《易经》里面还有很多关于矛盾的思想、势的思想，遗憾的是，后来的研究要么装神弄鬼，要么一味批判，没有很好地传承下去。我们中国的道家、儒家、程朱理学，恰恰是很有分量的精神遗产，中国文化是新闻传播学的源头活水，但是目前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够。

申启武：讲到中西文化，在本质上确实有很多差异，比如接受媒介的习惯；像数字电视的普及，就遇到消费习惯的瓶颈问题。

蔡铭泽：在中国人的办报传统中，还有很多舆论管理的思想。宋代的官报和小报，涉及消息来源、发行渠道等舆论管理的种种举措。现代的舆论控制和舆论引导，其实古代也非常讲究。言论自由、互相监督等，在历朝历代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比如谏议大夫这个角色，就是言官，起监督作用。

联系到我们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新闻传播的实践，或者说从媒介生态来看，与以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我们沉下去认真总结，可能出现非常有价值的理论成果。

申启武：说到当下的媒介生态，不能忽视的是生态恶化的一面。有一小部分节目和栏目，在不健康地经营着。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不能影响到自身的公信力。

蔡铭泽：现在“忽悠”一词相当流行。从积极的方面来看，社会在逐步法治化，政府的执政理念不断地与时俱进，国家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从消极的方面来看，问题也不少，存在着一切向钱看的不良社会风气，人际关系变得紧张、淡漠，职业规范和伦理也受到了冲击。媒体不仅要考虑舆论的引导，也要考虑价值的传承，不能一手硬、一手软。

申启武：其实，这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必须经历、必须跨越的一个阶段。

破除西方新闻传播理论的“霸权”才能掌握话语主动权

支庭荣：从广东传媒界的实践来看，有没有在理论上值得总结的地方？

蔡铭泽：广东的开放，尤其是观念的开放，走在全国的前面。广东的媒体，总的来说表现出色，既要满足意识形态的要求，获得各级政府的支持，又要让受众满意，还要走市场化道路，在新闻操作上不推波助澜，但是能够反映民众的疾苦。这种游刃有余，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是很难持久的。最为高明的是，媒体让领导满意，不仅仅是听命于领导，还得取得领导的认同。这里需要去总结概括。

支庭荣：具体到广播的“珠江模式”，是否具有特别的理论意义？

申启武：“珠江模式”对中国广播业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首要的一条是按广播的规律办广播，改变了传统的单向的我播你听的宣传模式，开创了专业台、类型台的先河。它在制度上也有创新，实行自收自支的运行机制。“珠江模式”其实就是在市场化过程中，广东广播业的一种自我救赎，因为1986年之前，香港广播在广东市场上占据70%的份额，本地广播严重倒挂，形势逼人，不得不然，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珠江模式”一出，大板块、主持人、大直播很快风靡全国，起到了一种思想解放的作用。

在今天看来，广播电视学术界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倾向，“言必称西方”，往往用西方的理论、案例来解释、指导中国的实践。这其实是一柄双刃剑，有值得商榷之处。中国的改革开放，当然吸收了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人类文明的许多优秀成果，在很多领域与国际惯例接了轨，但有一点不太可取，即如果纯粹按照西方的模式，不考虑中国本土的根基，那就是一种削足适履的做法。比如广播电视的集团化问题，一方面，集团化是必要的，在西方也是相当成功的，但拿到中国来就未必很合适。西方的广播电视集团，其基础是“自由恋爱”，中国的集团化，很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集团化也好，垂直管理也好，官办分离也好，要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媒体与西方媒体相比，性质不一样，使命不一样，自不能一概而论。中国实行的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如何能照搬西方的模式而获成功？单靠西方的各种“主义”，是解决不了中国的真问题的。因此，在借鉴西方理论的过程中，要考虑西方理论提出来的背景，看看与中国的情形是否有差距，这种差距是否足以颠覆对照抄照搬的质疑。

本土实践是学术创新鲜活的源泉

蔡铭泽：有人误以为西方的新闻传播理论非常系统和成熟，其实大谬不然，其很多理论是零散的。另外，西方人研究传播学理论，通常有各自的专业、各自的学术背景。比如心理学的、符号学的、管理学的、经济学的，等

等。不能把这种背景截然割裂开来。

申启武：做学术研究，要特别注意深入业界第一线，认真做调研，真正了解媒体的运作。比如研究全媒体，就需要深入业界的最前沿。有的媒体网站，甚至远远不如姚晨的微博的影响力。不深入媒体，就很难理解这一切背后的原因。

蔡铭泽：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关注和深入实践，应该成为高校新闻传播学教学研究者的必修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国内媒体有大量的创新实践。比如湖南卫视的娱乐和新闻，都有创新。全国各地的媒体，大多数也在体制内尽可能地创新。在师资培养上需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另外，学术腐败现象不仅有学术不端问题，也有学术泡沫问题。要做真正的大学问，必须“疯、迷、精”，扎扎实实做下去。举个例子，现在研究生的论文，都要技术查重，设想一下，如果学术著作也进行查重，会出现什么情景？从百年大计着眼，不宜提倡过度迎合不良的社会风气。一篇文章、一本书，至少要有 20% 以上的独家观点或创见，从长远来看，这才能真正立得住脚。

（本文由支庭荣、胡甜甜于 2012 年 5 月 11 日记录整理）

“报纸大众化”与“大众化报纸”

——成舍我办报理念与新闻思想初探（代序）

刘家林

成舍我先生逝世整整二十年了。他是中国现当代著名的一代报人、私营报业企业家和新闻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新闻学者。

在从事新闻事业方面，他是我国现当代新闻史上参与或主持创办新闻媒体最多的人。他一生参与或主持创办了“近20家新闻媒体，包括报纸、期刊、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其中，由他直接创办的达12家”^①。如最著名的有北平“世界报系”（《世界晚报》、《世界日报》、《世界画报》）、南京《民生报》、上海《立报》及《香港立报》，有人用“世界、民生、立报成舍我”^②概括他一生的事功和成就，至为恰当。他也是中外新闻史上从业时间最久、“工龄”最长的新闻记者。他从1912年夏（14岁读初中时）开始撰文向报馆投稿，到1991年4月病逝，前后从事新闻工作长达78年之久，是新闻战线上名副其实的“老兵”。他还是中国新闻史上产量最高的记者之一。早在1955年，成舍我在“盘点”自己的工作成绩时就说：“从我十四岁做‘职业记者’那时起，已经过四十年继续不断的工作。为了工作，虽然每天平均至少要写一千字，每年三百六十五天，四十年总（共）写了一千四百多万

① 见方汉奇：《一代报人成舍我》，载方汉奇：《新闻史上的奇情壮彩》，华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页。

② 宋小岚（卜少夫）：《世界·民生·立报·成舍我》，载《新闻天地》（重庆）1945年1月20日出版的第1期。

(字),但我从没有出版过一本‘文集’。”^①

在报学及新闻学研究方面,成舍我也有卓越的成就。他正式从事报学及新闻学的研究是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的。1930年初,成舍我在李石曾的赞助下于当年4月16日离开北平由上海乘法国邮船出国考察。他与程沧波(中行)先到法国考察新闻事业,后到瑞士日内瓦参加万国报界公会;旋到比利时布鲁塞尔报界公会发表演说,再到法国、英国等地考察报业,并到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听课;最后由欧赴美国考察,并应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威廉博士之邀,到该院进行学术交流,于1931年2月19日回到上海。考察期间,成舍我撰写了两篇通讯:《英法报纸之比较——我所见之巴黎各报》和《在伦敦所见——英国报界之新活动》。回国以后,为了培养新闻专业人才、研究新闻学术,1932年成舍我在北平石驸马大街甲90号《世界日报》旧址筹办“北平新闻专科学校”(简称“北平新专”,后迁西长安街)。1933年4月8日,“北平新专”正式成立。^②1933年12月14日,《世界日报》在当天第13版开辟新闻学研究专刊——《新闻学周刊》(后改为《报学半月刊》),每周出版。创刊号上首载成舍我《我们的两个目的》和张友渔《由消息的真伪谈到一个报纸的失败》。北平《世界日报》的《新闻学周刊》与北平《晨报》的《晨报特刊·新闻纸问题号》专刊(在《晨报》1922年6月4日星期日第6、7版刊出)、天津《大公报》的《新闻教育特刊》(在《大公报》1936年5月9日第12版创刊)、天津《益世报》的《报学半月刊》(在《益世报》1937年5月16日第14版创刊)等是在我国报纸上最早开辟的一批新闻学研究专刊(版)。以后,成舍我在《世界日报·新闻学周刊》、《新闻学研究》(燕京大学新闻系编)、《报学季刊》、《新闻学季刊》、《东方杂志》、上海《立报》、重庆《大公报》、香港《新闻天地》杂志及台北《联合报》

① 见成舍我:《报学杂著·自序》,载成舍我:《报学杂著》,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年版,第1页。

② 成舍我:《我所理想的新闻教育》记载“民国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新闻学校成立”,载《报学季刊》1935年第1卷第3期,第105页。

(1954年6月14日起)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有关新闻学的研究文章及他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术演讲稿。笔者经过广泛搜罗,共得60余篇。这些研究文章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观点新颖、眼光独到,充分反映出他的办报理念和新闻思想。这些观点及理论是我国新闻思想史上的一笔宝贵遗产和财富。它历久弥新,给我们以宝贵的启示。归纳起来,有如下数端。

一、对报纸性质、职责及功能的探讨,以及对新闻工作者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的强调

成舍我认为,“新时代的报纸”不是“一派一系”的代言工具,而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公器”^①,报纸是社会的“公共事业”,应“以维护公众利益”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他说:“新时代的报纸,他的基础,应完全真确建筑于大众‘公共福利’上面。新闻记者虽然不是真接受了大众的委任,但他在心中应时时刻刻将自己当做一个大众的公仆。”“他只知有大众的利益,不知有某派、某系或某一阶级的利益,更不知有所谓个人政治或营业的利益。所以报纸上的言论、记载,一字、一句,均应以增进‘公共福利’为出发点。”报馆编辑、记者“当时时刻刻了解报纸对于大众利益影响之重大。一篇不纯正的批评、一条不真确的消息,他的贻害社会,就数量言,可以有无量数的男女读众,就时间言,可以延长至几十百年以后。至于关系个人私德的事,尤当谨慎,稍一疏忽,小之可使当事者饮恨终身,大之可迫其羞愧自戕”。因此之故,“编辑室中的每一编辑,在挥舞他自己的工具——笔——的时候,当设想:在这个工具的下面,有整个民族的命运待他决定;有无数个人的生死祸福,听其转移”。新闻工作者必须以“拥(维)护公众利益”为自己的职责,“打倒那些漠视公众利益,轻率狂悖,对社会不负责(任)的传统谬见”。^②

^① 成舍我:《中国报纸之将来》,原载燕京大学新闻学系编辑的《新闻学研究》演讲及论文集,1932年6月初版;又见1932年5月6日至12日《世界日报》教育副刊。

^② 成舍我:《我们的两个目的》,载1933年12月14日《世界日报》第十三版《新闻学周刊》创刊号。

二、“报纸大众化”与“大众化报纸”

成舍我是我国报业史上最早提倡并身体力行“报纸大众化”与“大众化报纸”的报业企业家。“报纸大众化”是他一生的办报理念和办报情结，也是他一生的事业追求。1935年9月20日，成舍我在上海创刊了日后享有盛誉的“大众化报纸”——四开小型报《立报》。他在《立报》发刊词《我们的宣言》、《中国报纸之将来》、《“报纸救国”》、《如何使报纸向民间去》等文章中，详细申论了“报纸大众化”与“大众化报纸”的内涵、特征，以及“大众化报纸”的重要功能。

《立报》一创刊，就在发刊词中揭橥两大口号：一是“报纸大众化”，二是“以日销百万为目的（标）”。成舍我探讨的“报纸大众化”和“大众化报纸”的内涵及特征，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大众化报纸”在报价上必须“低廉”，要让“劳苦大众”“买得起”每天必须的“精神食粮”。^①成舍我认为，将来中国的“大众化报纸”应带有“公共事业”的性质，“报纸的价钱，固应该注意到一般社会的经济状况，然而报纸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公器，他实在兼有公园、图书馆两种不同的性质。一方面给人愉快，一方面给人知识。公园、图书馆，即在资本主义的国家，也多半一律公开，不收分文。那么，报纸纵不能完全免费，（但收费）也要收到极可能的少”。“也就因为报纸要民众化，自不应该多收报费。他是社会上最重要的公器，他实在应该尽可能像公园、图书馆一样，给民众以公开欣赏阅读的机会。至于报价方面的损失，就中国而言，在将来工商业发达以后，自可向广告方面去取偿。”^②二是“大众化报纸”要普及，发行量要大，要“向民间推广报纸”，要“使报纸向民间去”^③。成舍我宣称，《立报》要“以日销百万份为目的（标）”，要成为“侵入”千家万户的“家庭报”。三是在内容上要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且与大多数国民，痛痒相关”。大众生活、民生新闻应是“大众化

① 成舍我：《我们的宣言》，载上海《立报》1935年9月20日创刊号第一版。

② 成舍我：《中国报纸之将来》，原载燕京大学新闻学系编辑的《新闻学研究》演讲及论文集，1932年6月初版；又见1932年5月6日至12日《世界日报》教育副刊。

③ 成舍我：《如何使报纸向民间去》，载《报学季刊》第1卷第3期（1935年3月29日出版）。

报纸”的主打内容。四是在文字表达上，“大众化报纸”必须通俗易懂，文章必须短小精悍，精练、生动、传神、“有趣”。总而言之，“中国多数报纸，定价高、篇幅多、文字深”，“内容艰涩”，“所载材料，又恒与最大多数国民，痛痒无关”，“以致现有报纸，只能供少数人阅读，最大多数国民，无法与报纸接近”。而“大众化报纸”，是让占最大多数的“劳苦大众”读得起、看得懂的报纸，“使全国国民，对于报纸，皆能读、爱读、必读，使他们觉到读报真和吃饭一样的需要，看戏一样的有趣，然后，国家的观念，才能打入最大多数国民的心中，国家的根基才能树立坚固”，才能“达到‘立己’、‘立人’和‘立国’”的目的。^①为此，成舍我还在《立报》发刊词中阐明了该报的营业和编辑方针，声明了今后办报的“四原则”：①“凭良心说话”；②“用真凭实据报告新闻”；③“永远保持‘一元钱看三个月’廉价报纸的最低价格，绝不另加丝毫，以增重读众的负担”；④“终年为读者服务，无论任何节日，概不许有一天的休刊”。在《三种报纸的出路》一文中，成舍我概括了“大众化报纸”的三个“条件”，即“第一是要人人买得起，第二是要人人看得懂，第三是雅俗共赏”。^②

三、“大众化报纸”是向民众灌输“国家意识”、“民主政治”的利器，是促进“国民精神养成”的温床，也是加强公民教育、提高国民整体素质的教材

成舍我在《“报纸救国”》一文中讲了一个生动的小故事，说的是1930年初他出国考察报业时和几位朋友住在“巴黎都来福街一所小房子里”。房东是一个铁厂工人，家里的一切家务，都由他家一个60多岁的老太婆管理。平时，这位60多岁的老太婆天天都要到所有住客的房间铺床扫地，打扫卫生，总是“满面春风，欢喜和客人谈些小故事”。忽然有一天，“意大利和法国，为着一些零星问题”，“形势严重起来，两国各陈兵边界，大有一触即发

① 成舍我：《我们的宣言》，载上海《立报》1935年9月20日创刊号第一版。

② 成舍我：《三种报纸的出路》，载复旦大学新闻系编《报展》纪念刊1936年版，第45页。

之势。报纸上天天登着惊人的大字，并鼓励人民准备一切，作政府后援”。这时，房东老太婆一反常态，“神情大变，老是哭丧着脸，一言不发的低头做事”。“我们为着好奇心驱使，问她有什么不快乐的事情”，“不料她竟滔滔不绝的将真心话告诉我们。”她说：“因为这几天，意大利太欺负我们法国了，看这情形，假使意大利不让步，我们的政府是会不惜一战的。”“我有三个儿子，老大、老二都在欧战中牺牲了，现在只剩老三了。当年老三还没到服兵役的年龄，现在已达到了，一旦打起仗来，免不了被征入伍。现在飞机大炮比以前更加凶猛……我一想到老大老二的牺牲，就替我这‘硕果仅存’的老三担心，所以这几天几乎连饭都吃不下。”“我们安慰她，说：‘你不可以想法子，叫你儿子，早些躲避么？’她把脸一沉：‘这是什么话，国家荣辱所关，我怎能做这样无心肝的事，况且我就要做，我儿子也不会答应的。’我们问她，这些意法交恶的消息从何听来。她于是指着我们桌上放着的一份小日报（Petit Journal）说：‘我天天看这个报，一切都是他告诉我的。’”平时每天早上，总能看到老太婆从菜市回来，手里挽一个菜篮，篮子里装起面包小菜，“而盖在篮子上面的总是一份人人可以买得起、看得懂的大众化报纸”。由此，成舍我发出感慨：“在咱们中国呢？广大的乡村，固不必说，即以重要都市而论，有几个被目为下层社会的人，能买得起、看得懂一份报。因为买不起，他们也就索性不买了，因为看不懂，他们也就索性不看了，再加以国民教育的不发达，所以最大多数国民，对于国家，总觉得那是另外一些人的私有物，与他们不生关系。他们的脑筋，没有什么国家存亡荣辱的观念，大清帝国也好，中华民国也好，甚至再换一个招牌，似乎也无所谓。”“人家几千万国民，就有几千万国民和国家共存亡，我们号称四万万五千万的大民族，但是遇到敌国外患，恐怕至少就会有五分之四，天天在那里想挂洋旗。‘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试问这样的国民思想，如何可以撑得起几百万方里一个世界上偌大的国家？”因此之故，“我们必须借着报纸的力量，使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国家和个人，是一而二、二而一。贪官污吏，侵吞了国家一个小钱，大家心痛，就等于自己家里辛苦喂成的鸡鸭，被扒手偷去一

样，纵然不能请求警察作有效追捕，但是假若知道了这个贼的所在，一定要去和他拼个你死我活。至于国家领土，若是遇到异族的侵略，那么，占去了国家的一寸土，就等于各人自己的一间屋、一亩田被人霸占了一样，只要有一份力量，子子孙孙，总不肯善罢甘休。人人如果都有这样国事等于家事的精神，岂但目前的内忧外患不成问题，就是中华民国，整个被人家征服了，我们也自有光复旧物，还我河山的一日”^①。

四、“精编主义”

纵观成舍我的一生，他对小型报情有独钟，大力提倡，并形成了系统的小型报办报理论。他说：“小型报纸（即我国所谓四开报）……因为篇幅小，便于携带，且甚美观，在公共汽车及旅行中，均较大张的报纸容易阅读。妇女界尤特别欢迎。”在编排方面，小型报对“新闻的选择，也必须更趋谨严，一切力取‘精编主义’，量减而质增”^②。

在办小型报方面，《立报》是成舍我一生的事业，也是“大众化报纸”的典范。《立报》创刊于1935年9月20日。它一创刊就表现出大众化小型报的鲜明特色。一是报价低廉，通俗易懂。创刊当天，《立报》就刊登广告词云：“直接订阅，三月只收报费一元”（见《立报》创刊号三版左侧）；“只要少吸一枝烟，你准看得起；只要略识几百字，你准看得懂”（见四版右侧）；“永远不增价，终年不休刊；凭良心说话，拿真凭实据报告新闻”（见二版右侧）。二是在版面及内容上贯彻、实行“精编主义”。

在具体实施“精编主义”的过程中，《立报》在版面、内容上有以下两大特色：

一是在新闻报道方面，实行“精编”原则，以“新闻精”自诩。该报编辑包天笑在《新闻精》一文中云：

^① 成舍我：《“报纸救国”》，载北平《世界日报》1935年11月14日第十三版《新闻学周刊》第98期。

^② 成舍我：《中国报纸之将来》，载燕京大学新闻学系编《新闻学研究》（燕京大学、良友公司、颀华印书局，1932年6月初版）。